

二〇〇九年度国家社科规划项目

范仲淹集笺注研究

范祖宜 敬跋

牟永生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二〇〇九年度国家社科规划项目

牟永生 著

范仲淹奏章研究

范敬宜题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仲淹忧患意识研究/牟永生著.—南京:南京
大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 - 7 - 305 - 10309 - 4

I . ①范… II . ①牟… III . ①范仲淹(989~1052)
—思想评论 IV . ①K827 = 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9278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范仲淹忧患意识研究

著 者 牟永生

责任编辑 郭艳娟 施 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20 千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0309 - 4

定 价 20.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牟永生教授是一位具有哲学博士研究背景的学者，年富力强。他在大学主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名著导读”和“中国传统文文化概论”；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儒道佛三教心性哲学与价值哲学”等课题的研究，著述丰硕，颇有建树。牟永生教授又是中国范仲淹研究领域的一名专家，凭着他丰富的学识和专研精神，几年前，他主动担当起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范仲淹忧患意识研究》的工作。作为呼应，2012年12月在第四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大会上我发表《范公精神的哲学内涵与核心价值探析》一文，并向大会介绍了牟永生教授的研究情况，引发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

今年元月二日，我接到牟教授专函，告知国家课题《范仲淹忧患意识研究》已通过专家评审，完成结项。捧着他22万字厚厚的研究文稿，我的敬佩与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北京的春天，还感受不到桃红柳绿的江南气息。难得有一个到北海公园边305医院调养两周的机会，恰好给了 I 静心拜读牟教授大作的时间。说实话，读哲学论著没有像读中外小说那样娓娓道来，赏心悦目，轻松惬意。但是，一部优秀的哲学论著，以其强大的逻辑思维、精密的语言描述、鲜明的哲理观点，给人一种醍醐

灌顶、振聋发聩的启示，给人一种思想精神的洗礼和价值导向的疏理，这就是哲学的力量。

牟永生教授的哲学论著《范仲淹忧患意识研究》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

—

聚焦古老而重大的哲学命题。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在范仲淹的精神世界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仿佛是一种“出世哲学”；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则更像是“入世哲学”。入世和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对立的一样。但是“范公精神”令人信服的恰恰是在这两极对立中寻求到一种完美的综合。按冯友兰先生的说法：“能够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中实现这种综合的，就是圣人。他既入世，又出世；中国圣人的这种成就相当于佛教中的佛和西方宗教里的圣徒。但是中国圣人的这个成就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漫游山林、独善其身；他的品格可以用‘内圣外王’四个字来刻画。内圣，是他的内心致力于心灵的修养；外王，是说他在社会活动中好似君王。”范仲淹就是冯友兰先生描述的这样的一位圣人。

圣人是怎样形成的，圣人的哲学世界是怎样的，圣人的内圣外王的品格是怎样的，这是中国哲学所要解析的重要课题。牟永生主持的《范仲淹忧患意识研究》，聚焦的就是中国哲学领域里这一古老而又重大的命题。

二

展现系统而缜密的学术风范。牟永生开展的这项研究，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借鉴风险社会（risk society theory）和海恩法则（Hain rules）等现代理论，运用史论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聚焦范仲淹忧患意识的文化资源、形成发展、哲学基础、核心价值、逻辑结构、主要特质、历史地位和当代意义，构建了完整的研究路径，开展了深入的剖析论证，展现了系统的缜密的学术范式。

考察范仲淹忧患意识的文化资源。牟永生认为：范仲淹忧患意识具有十分丰富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它至少表现为易学的、儒学的、道学的和佛学的四个层面。范仲淹极为重视易学，特别是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思想，将之视为其忧患意识和新政主张的重要理论根据。

梳理范仲淹忧患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牟永生认为：范仲淹忧患意识经过了一个由酝酿，到形成，再到发展的历史嬗变过程。幼年丧父、少小贫寒，断齑画粥，刻苦学习，为忧患意识的形成作了充分酝酿。仕途磨砺，体察民情，冒哀《上执政书》，标志着其忧患意识的正式形成。西北戍边，庆历新政，宦海沉浮，通过《上吕相公书》、《答手条诏陈十事》和《岳阳楼记》等表述，反映了范仲淹忧患意识的深化与发展。

追问范仲淹忧患意识的哲学基础。牟永生认为：范仲淹以《周易》、《中庸》和《大学》等理义为宗，奠定了其忧患意识的变通观念、忠义思想和民体情怀之哲学基础。变通就是指宇宙万物和社

会人生之变易与通达之理。作为范仲淹忧患意识重要哲学基础的变通观念，主要是指其充分运用《周易》等经典的哲学智慧，为化解宋朝积弊已久的内忧外患，所采取的一系列变法主张而追问理论依据的思维范式。

探索范仲淹忧患意识的核心价值。牟永生认为：范仲淹忧患意识的核心价值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要确认一种思想系统有无核心价值及其具体内容，既要看该思想家和后人是否强调，也要看它是否具有统摄性、包容性。在范仲淹留下的丰富诗文中，虽然我们找不到直接用“以天下为己任”的命题来统摄和囊括其忧患意识的核心价值，但与之名殊而体一的“忧天下”、“保天下”和“治天下”等说法所构成的科学天下观，却俯拾皆是，不一而足。“以天下为己任”，不仅是范仲淹言行的一贯要求，亦是后人的一致评价。

剖析范仲淹忧患意识的逻辑结构。牟永生认为：范仲淹忧患意识内容丰富，至少蕴藏五个层面：一是担当精神，二是进取精神，三是超前精神，四是整体精神，五是人文精神。它们组成了范仲淹忧患意识完整的逻辑结构。

辨析范仲淹忧患意识的主要特质。对于范仲淹忧患意识的特质，牟永生认为：从其本质与作用之间的辩证联系上看，是内圣外王，体用不二。体者，本也。这是范仲淹忧患意识的根本所在，而范仲淹本人的道德文章及其文治武功，正是其忧患意识的逻辑展开与升华。从范仲淹本人拳拳忧国忧民之心与立德立功立言之行的视阈看，其忧患意识又表现出文韬武略，知行合一。集将、相、儒于一身，“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国，德足以传世”的范仲淹，其忧患意识正是如此。他不仅自幼“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更有“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的事功伟绩。范仲淹

忧患意识还表现出至诚许国，进退如一和是非循环，忧乐一体的内在特质。范仲淹忧患意识不是悲观绝望，更不是患得患失，而是一种自觉而强烈的担心、牵挂和关爱。

三

揭示中华民族宝贵的人文精神。北宋以来，范仲淹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至圣至贤的杰出代表被推崇备至。宋仁宗亲篆“褒贤之碑”，朱熹称颂“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黄庭坚评价“当代文武第一人”，王安石拜为“一世之师”。南宋学者刘祁点评范仲淹“知行合一，进退如一，兴利除害，补世益民”。明代学者王真赞扬范仲淹“其德业之盛，不愧乎古人”。清康熙、乾隆御题“济时良相”、“学醇业广”金匾褒奖。毛泽东特别赞赏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名言，曾说“‘先忧后乐’的思想，较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提法，境界更高了”。“范文正公”深受天下百姓的爱戴。

在近现代，有许多中外学者潜心于范仲淹研究，中国台湾汤承业教授的《范仲淹研究》、新加坡陈荣照教授的《范仲淹研究》、苏州学者方健的《范仲淹评传》和中国人民大学诸葛忆兵教授的《范仲淹研究》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还有20世纪以来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极大地丰富了范仲淹人文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牟永生教授《范仲淹忧患意识研究》又从哲学分析的视角，揭示了中华民族这一宝贵人文精神的特质，以及它的历史作用与当代意义。

牟永生指出：历史上朱熹将范仲淹、诸葛亮、韩愈等称为“五

君子”，这足见范仲淹人格魅力所具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影响。范仲淹忧患意识不仅影响其同时代的韩琦、富弼、苏舜钦、欧阳修、孙复、胡瑗、石介、李觏、张载和王安石等人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苏轼、二程、朱熹、陈亮、叶适、陆游、范成大和文天祥等人的思想。明清时期，范仲淹忧患意识的影响尤为突出，康乾二帝同赞范仲淹具有忧乐与民的高义品质。李贽、王直、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俞樾等一大批社会精英的忧患意识就深受其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距离范仲淹时代越是久远，范仲淹忧患意识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不是越来越弱化，而是越来越广泛而深远；越是处于求新求变、救国救民的非常时期，其影响也不是越来越式微，而是越来越重大而深刻。范仲淹忧患意识对近现代熊十力、胡适和钱穆等人影响亦是如此。

牟永生认为：范仲淹忧患意识不仅在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已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为民兴利除弊的不竭精神动力。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实现科学发展，它仍然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范仲淹忧患意识对于价值导向的意义，对于科学发展的意义，也同时就是对于社会和谐的意义，这是由于与价值导向、科学发展相较，社会和谐具有更大的总括性和融摄性。因此，越是盛世太平，我们越应增强风险意识，强化使命感、危机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沉着应战，及时有效地化解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周边危机。知识分子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更应不辱使命，站在时代前列，将忧国忧民之心、爱国利民之志化为具体行动，以促进各阶层间的意见沟通、各民族间的文明对话，协调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价值冲突，促进世界文明。

范仲淹的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就是冯友兰先生概括的和牟永生教授揭示的“内圣外王”的圣人品格，千百年来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祖国、为人民奋斗不息，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人文精神和思想财富。传承和弘扬范仲淹的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教育和鼓励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牟永生教授主持的国家课题《范仲淹忧患意识研究》完成结项，这是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中国范仲淹研究在哲学领域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在此，谨向牟永生教授和课题组的学者们致以诚挚的祝贺与敬意！同时，也期盼这部论著早日付梓出版，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范国强

2014年3月12日于北京西钓鱼台

(范国强，著名学者。范仲淹30世孙，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博士、教授，全国性社团专家评估组组长，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会长。)

目 录

| | |
|-------------------------------|-----------|
| 序 | 1 |
| 导论 | 1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现状 | 1 |
|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目标 | 13 |
| 三、忧患与忧患意识 | 25 |
| 第一章 范仲淹忧患意识的思想渊源 | 35 |
| 一、易学之源 | 36 |
| 二、儒学之源 | 44 |
| 三、道学之源 | 52 |
| 四、佛学之源 | 60 |
| 第二章 范仲淹忧患意识的历史进程 | 68 |
| 一、范仲淹忧患意识的酝酿 | 68 |
| 二、范仲淹忧患意识的形成 | 78 |
| 三、范仲淹忧患意识的发展 | 88 |
| 第三章 范仲淹忧患意识的哲学基础 | 99 |
| 一、变通观念 | 100 |
| 二、忠义思想 | 109 |
| 三、民体情怀 | 120 |

| | |
|-------------------------------|-----|
| 第四章 范仲淹忧患意识的核心价值 | 133 |
| 一、仲淹言行的一贯性 | 133 |
| 二、后人评价的一致性 | 143 |
| 三、言简意赅的一统性 | 156 |
| 第五章 范仲淹忧患意识的基本内容 | 166 |
| 一、担当精神 | 166 |
| 二、进取精神 | 174 |
| 三、超前精神 | 182 |
| 四、整体精神 | 189 |
| 五、人文精神 | 197 |
| 第六章 范仲淹忧患意识的主要特质 | 207 |
| 一、内圣外王，体用不二..... | 207 |
| 二、文韬武略，知行合一..... | 216 |
| 三、至诚许国，进退如一..... | 225 |
| 四、是非循环，忧乐一体..... | 235 |
| 第七章 范仲淹忧患意识的重要地位 | 242 |
| 一、对宋元忧患意识的影响 | 242 |
| 二、对明清忧患意识的影响 | 249 |
| 三、对近现代忧患意识的影响 | 256 |
| 第八章 范仲淹忧患意识的当代意义 | 262 |
| 一、对于价值导向的意义 | 263 |
| 二、对于科学发展的意义 | 268 |
| 三、对于社会和谐的意义 | 273 |
| 主要参考文献 | 280 |
| 后记 | 283 |

导 论

在以儒道佛三教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常谈常新。从孔孟的“君子忧道不忧贫”，“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老庄的“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到佛禅的“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再到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优先乐后，均表现出中国思想文化的忧患传统和特有属性。尤其是集三教忧患思想之大成的范仲淹忧患意识，不但对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忧患意识的走势具有深刻影响，在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现状

“问题意识”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是人们对存在问题的能动性、探索性和前瞻性反应，不仅是一种面向本体和前提的思考，更是面向现实生活世界的思考。马克思认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

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毛泽东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②有学者进而提出，历史无非就是问题的消亡和解决，现实也无非是问题的存在和发展。这些都说明问题与我们每一个人皆息息相关，我们所处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的世界。没有“问题意识”，就不可能关注和提出问题，更不可能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意识”已成为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实践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看，问题不仅是科学的研究的起点，更是实践发展的契机。强烈的“问题意识”，作为思维的动力，能够促使人们去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是正确提出和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民族如何独立、人民如何解放等重大问题。新时期新形势下，我们的第二、三代领导人创造性地回答了“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1. 选题缘起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君子忧道不忧贫”，这作为中国哲学特有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凝聚人心、协和万邦的不竭精神动力和智慧法宝。“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天下最大事，莫非万民之忧乐。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9页。

之乐而乐。这就是我的座右铭，我要用行动来实践它！”^①这作为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进取精神在历史和当代中国的积淀与创新，已成为学界、政界乃至全社会的共识。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现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内出现了持续升温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日益成为华夏儿女的共同心声。“古为今用”，“中西结合”，“推陈出新”，迅速成为我们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战略方针。传统文化研究机构，或类似的学术组织，有的还是国际性的学术研究机构，遍布全国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和企业单位，注册会员人数逐年成倍增加。甚至有些中学也纷纷建立读书会、研究会，诵读经典，陶冶情操。孔子学院及其相似的文化培训机构也快速落户东南亚和欧美主要国家，目前已经超过300家。如果包括网络孔子学院、广电孔子学院在内，那么此数字可能还要翻好几倍。孔子学院已经成为我们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品牌和新的文化现象。

兴起于国内的“传统文化热”，进而延伸至欧美等国的“国学热”，不仅使传统的学科设置与分类再次引来热议和扩容，“国学”有望成为一级学科，衍生出“经学”等若干二级学科，培养自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国学专门人才，而且也使我们再次提出和考量中西文化的异同等比较哲学问题。本书除了继续讨论中西思想文化所具有的逻辑思辨性与直觉体悟性、个体本位性与整体性、外向型与内

^① 温家宝：《温家宝总理论黄宗羲思想的亲笔信》，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6期。

省内求型和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等思维方式的相异互补外，更为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所具有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问题。譬如，中西方均十分重视忧患意识问题，但具体风格似乎又不尽一致。西方人倾向于追问、反思，以原罪的方式、宗教的方式提出和解答忧患问题，而中国人则更喜欢展望、期待，以前瞻的方式、道德的方式提出和解答忧患问题。

苏州作为一座具有 2500 年历史的现代化城市，它既有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西方文化的流光溢彩，这里工业园区、高新区经济科技与社会发展并驾齐驱，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让苏州一直保持着江苏，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地位。目前正在实施的“三区三城”的新战略发展工程，使苏州迅速成为科学发展的样板区、开放创新的先行区和城乡一体化的示范区，以及高端产业城市、最佳宜居城市和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的文化旅游城市。它更有十分深厚的人文资源，有昆曲、评弹、苏剧的苏州文艺“三朵花”，有“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的“东方威尼斯”，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古典园林，有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吴门画派人物，还有季札、伍子胥、孙子、白居易、范仲淹、文天祥、韩世忠、况钟、林则徐、冯梦龙、顾炎武、归有光、翁同和、柳亚子、沈钧儒、邹韬奋、章太炎、叶圣陶等五百位历史名贤和近百位苏州籍院士。

在苏州丰富的人文资源，特别是历史名贤中，最具代表性又最具有当代价值的，莫过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和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两位旷世大儒。他们虽然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所面临的具体社会矛盾有异，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以及所遵循的根本原则和路径也明显有别，然他们都深怀着心担天下、情系

百姓的忧患意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有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①这是一种先忧后乐的担当精神、责任精神。顾炎武的天下优先观也是一种担当精神和责任精神：“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②

近些年来，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们在充分享受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同时，自然环境日趋恶化，矿产资源不断枯竭，气候特点日益怪异，疾病流行成高发态势，天灾人祸频频发生。特别是中国汶川大地震，日本大地震和海啸，还有洪灾、旱灾、火山爆发等，都让我们不寒而栗，顿觉人类生命依然十分脆弱，生存问题远未成为昨日话题。我们一方面对人类的中心地位及其聪明才智欢欣鼓舞，骄傲自豪，我们也为能够生活在人类文明大大进步的今天而感到知足和庆幸，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明白，人类发展到今天，它所走过的历史（约两三百万年）才刚刚开始，人类未来的“历史”不知还有多少个两三百万年！我们人类还处于婴幼儿时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抵御灾害、呵护生命的能力也亟待提高。“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

^① 李勇先等点校：《范仲淹全集》（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以下凡引本书者，仅注点校者、书名、卷号及页码。

^② 顾炎武：《正始》，《日知录》卷17。